

现代主义的政治

—反对新国教派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英] 雷蒙德·威廉斯 著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53



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主义的政治

——反对新国教派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阎 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英)威廉斯著;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7-100-03431-0

I. 现… II. ①威… ②阎… III. 现代主义-政治理论-文集 IV. D09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2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现代主义的政治
——反对新国教派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阎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431-0/B·518

200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¼

定价: 16.00 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总序

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4 总序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编者按	1
编者引言: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3
1. 现代主义是何时?	47
2. 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	54
3. 先锋派的政治	71
4. 语言与先锋派	92
5. 作为政治论坛的戏剧	116
6. 《现代悲剧》编后记	136
7. 电影与社会主义	152
8. 文化与技术	170
9. 政治与政策:艺术委员会的实例	200
10. 文化研究的未来	214
11. 文化理论的运用	230
附录:媒介、边缘与现代性(雷蒙德·威廉斯与 爱德华·萨义德)	250
索引	281

编者按

ix

雷蒙德·威廉斯本人有关他的“可能的著作”最详细的计划，是复写在背面的，但读者们马上就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对这些文章的组织，在有些方面与威廉斯本人对文章的组织不同。最终没有采用威廉斯的草案有三个原因。第一，它删去了《语言与先锋派》一章；其次，正如各种箭号、星号和括号所提示的，威廉斯本人似乎还在不断捉摸自己文章排列的不同的可能性；再次，有另外两个稍稍不那么详细的计划，它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不同于这儿所复写的计划。此外，有两章的定稿缺失，它们的确是有点关键的篇章，而雷蒙德·威廉斯最后再也没有写过；正如在《引言》中所解释的一样，我们决定收入其他相关的文本，它们在主题上也许可以替代那些未完成的文本本身，而那些文本需要根据各篇文章的顺序作进一步的改变。相应地，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种我们认为在发展中的论点的基本逻辑，以便组织这些文章，希望这样做仍然会忠实于雷蒙德·威廉斯心目中的计划。

托尼·平克尼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

↓
Possible book

Now →

* (New) Modernism & the Modern

→	Culture & Technology (from 2000)	12
	Politics of the Avant-Garde	7
	Receptacle Reception	7
	Modernism as a Political Form	7
	Cinema Lecture	5
	Art's Council Lecture	3
	Nature of Cultural Theory	8
→	Against & Confirms <small>the New</small>	10

→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Lecture Lecture)	5

		<u>62</u>

编者引言：现代主义与 文化理论

1

1987年12月，雷蒙德·威廉斯应邀为即将召开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大会全体会议发表讲演，他于1988年1月14日回信说：“我非常高兴5月7日在牛津作《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讲演”，并接着说，“我有两篇论现代主义的新文章，即将发表在《视觉与蓝图》上。”¹几个月之后，文章的确发表了，但那篇大会论文却没有写出来或者没有发表出来。接到邀请12天之后，雷蒙德·威廉斯在萨弗伦·沃尔登他的家中去世了，享年66岁。

威廉斯一直在就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进行工作，这在一段时间里是很清楚的。1981年，他就先锋派构成的性质而提出的一连串5个理论“假设”，出现在《文化》中；对于“跨国的”资本主义时代中现代主义及其悖论的命运所作的简短有力的分析，成了《在社会中写作》里《超越剑桥英语》一文和《走向2000年》一书的特点。1985年，威廉斯向《幻想之城：现代欧洲文学艺术中的城市体验》一书提供了一篇论《大都市与现代主义的出现》的重要文章，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群又可以与之在《视觉与蓝图》中进行合作的知识分子。1986年在牛津出席“批判的状态”会议的与会者，没有哪个会忘记他那要求“分辨各种现代主义”（借用弗兰克·克莫德的一句老话）

4 现代主义的政治

所引起共鸣的激情；《文化理论的运用》一文，后来把“简化的、缓慢的形式”同真正探索性的和实验的形式区别开来。同一年，威廉斯在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语言和先锋派》一文。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评论，包括 1980 年论卢卡契的《现实主义论文集》的《又是现实主义》和 1983 年的《后现代主义的间离语言》。最后，《先锋派的政治》和《作为政治论坛的戏剧》两篇文章，
2 于作者去世后的 1988 年春天发表在《视觉与蓝图》上。

但是，在威廉斯过早去世之后，最初并不清楚这批文章总计有多少，看来很有可能是，我所列举的文章会被零散地并入马上就开始筹划的威廉斯著作的各种集子中去。只有在他的文章和注释中发现了关于《现代主义的政治》这一“可能的著作”的详细计划时，他的最后计划的范围和整体才终于变得清晰起来，它的组成部分才可能从未来的几部《论文选》当中被挽救出来：那些计划之一在这里被当作卷首插图复制出来。然而，它们本身却提出了几个编辑上的问题。文本的正文大多存在着，虽然论《文化研究的发展》这篇关键文章没有整理成最后的书面形式；特别是，威廉斯关于广告作为现代主义最终家园的各种想法，从未充分展开过。不过，更重要的是，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威廉斯对现代主义的全部反思，标题分别是《现代主义与现代》和《反对新国教派》——看来都没有写下来。《现代主义是何时？》的一批讲演札记保存了下来，这看来很可能是第一章的草稿；但在《结论》中，除了它那引起人兴趣的标题外，什么都未保存下来。

这篇文章的亡佚是令人难过的，它使本书失去了对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案明确而有争议的阐述，而这一直是它所为之努力的。

爱德华·汤普森在他对《文化与社会》一书的评论中提出了“斗争的全部方法”，把它作为对文化的较好的定义，而不是威廉斯本人的“生活的全部方法”的定义，从那以来，经常有人证明：雷蒙德·威廉斯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过分宽宏大量（而且在风格上也过分抽象），以至于不能成为一位有力的辩论者。但是，如果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文化理论的运用》持久的力量和激烈的程度，那么这种设想就是十分错误的。《反对新国教派》没有保存下来，由于它那意图明确的目的，这无疑是幸运的，人们很有可能会感到正确的是，威廉斯经常仿效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冷酷、难缠的家伙”。²但是，正如《现代主义的政治》在总体上提出的，“国教派”提到了一种与现代主义有意的决裂或对现代主义的判断，它实际上仍然暗中地处在后者本身的各种范畴的支配下——这是一个悲剧性“结合”的例子，在威廉斯看来，它明确地被集中在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中。相应地，我们决定在本书中收入1979年的《〈现代悲剧〉编后记》，它至少抓住了对“新国教派”进行批判的特殊的文学方面，清醒地证实了自我庆幸的、引人注目的激进主义，常常被它们显而易见的对手的情感结构所俘获。这篇《引言》的一项任务是，把这种个案扩大为文化理论。因为《现代主义的政治》坚持认为：现代主义作

3

为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不可能凭文学理论的各种牌子来把握，它在一种自我伺服的循环中，实际上产生于它本身的过程和策略；本书也必须被相应地理解为某种总体的文化社会学的强有力的论题介入，以及地方史的个案研究。

1983年，威廉斯庄重宣布：“自觉的‘现代主义’的时期行将结

6 现代主义的政治

束”；³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始于何时？它包括哪些人？“先锋派”是它的同义词、它内部的分支，还是它的替代者？还有，什么是“自觉的”现代主义？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现代主义吗？正如许多派别的批评家所指出的，“现代主义”是所有主要的艺术—历史“主义”或概念中最令人灰心、最没有特点、最难以处理并且最不能确定时期的。现代主义宣告时间本身只不过是无意义的流逝，它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于“有机社群”静态的、神秘的或循环的(非)暂时性的结束；而悲剧性的、分裂的时刻——如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对有机社会“自动楼梯”的回顾所作的过分尖刻的研究表明的一——要遭受一种无穷的倒退。毫无疑问，一切美学上的创新都被认为是它们自己的历史时代令人惊愕的现代，哪怕它们本身是在一种“返回本原”的引起争议的口号之下开始的。然而，当这种不可避免的新奇性(一种风格创新仅仅在形式上的副产品，其实质却来源于别的[宗教的、社会的]资源)终于被抽象出来，以其本身成为一种内容之时——一种形式就成了一种实质，一种基质于是就悖论性地成了它自身的材料——我们的确就进入了“自觉的现代主义”的时代。

然而，这个时代的分界线则令人烦恼地被证明是有弹性的。一种在定义上“自觉的”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它自己的现代性的理论，正如其状况可能是欣快的或者是抑郁的一样。在前者的情况下，艺术在主题和形式两方面都肯定会成为一种后传统社会令人振奋的推动力，它将粗暴地扫除封建主义约束性的残余，不只是解放科学和工业，而且也要解放个体本身在体验上的各种可能性。确实，这种推动力也许具有它的约束性的和赋予活力的各个方面；

但是，它的破坏性却属于那种“世界历史上”巨大的强度或者属于前所未有的内在强度，以至于背弃这样的骚动的艺术，会以那种对待最古老的学院风气的姿态来谴责自身。这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获得了很多我们习惯于想以那些标签来划分的东西：波德莱尔的诗，和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提到的那些人的诗（“孤立和失去联系成为一种新的、活跃的概念的条件……一种‘活力的狂欢’，一个‘狂热欢乐’的瞬时的和短暂的世界……一种新的快乐，身份的一种新的扩展，他们把这称做是在人群中沐浴”）；⁴ 或者如里姆鲍德著名的号角所称：“它的确存在于绝对的现代之中”；或者是乔伊斯和伍尔芙的“意识流”法规所确认的当代城市生活分裂和增殖并存的感知特性；埃兹拉·庞德的“使之更新”；在所有这些当中最为喧闹的是意大利和俄国的未来主义，对他们来说，马里内蒂的《第一篇未来主义宣言》是很有代表性的：“直到现在，文学还在赞扬一种忧郁的静止，心醉神迷和麻木。我们却想赞美胆大妄为，兴奋的失眠，赛跑者的大步迈进，垂死的跳跃、猛击和拍打。”⁵

但是，这种年代学的焦点（大约从 1850 到 1920 年）不可能得到认可。对力本论的赞颂，自我的可能性发狂的增殖，实际上先于这个特定阶段，并且在它之后延续。威廉·华兹华斯在《序曲》开头几行中仍然在表达一种令人陶醉的心灵的“后传统主义的”扩张之时，他毕竟还没有读过马里内蒂或马雅科夫斯基的作品：

世间横亘于我面前。怀着一颗心
欢乐，它的自由未受惊吓，
我四处环顾；倘若我所选择的路标

8 现代主义的政治

恍若一片游云

我就不会找不到路。我又歇了口气！

思想的恍惚，心灵的安定

快快向我袭来吧……

一旦现代主义在实质上被界定为“促进”，那么浪漫主义对各种冒险和文化灭绝（“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以及被它无限化了的主体，立刻就会变成一种现代主义——即使它仍然明显缺乏马里内蒂的摩托车和机关枪。但是，也因为如此，在年代学系列的另一端，却有很多我们可以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当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底浦斯》中宣称“患精神分裂症外出游走是一种比躺在分析家床上的神经过敏更好的模式”之时⁶，他们显然还处在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或者伍尔芙的达罗威夫人缓步从容、偏离中心地穿过伦敦中心的现代主义的疑虑之中。对于马里内蒂的“速度之美”或者“革命的五彩缤纷的、多种声音的潮流”来说，“川流不息”和“非领土扩张”在这里则成了另一种含混的语言；固定不变的敌人再也不是意大利艺术的法典，而是弗洛伊德的俄底浦斯。简言之，根据这种说法，现代主义成了一种循环主义，实际

5 上包括了后封建的现代性的整个时段；在必要时，莎士比亚的埃德蒙、戈内里尔和里甘甚至也可以进入其中。

“那就让他们来吧，那些狂热的同性恋煽动者！”马里内蒂于是力图召唤新一代的未来派出现。但是，在第二种“自觉的现代主义”之中，煽动者们“早已”来了，他们点燃了图书馆，使沟渠改道，去淹没博物馆，以一种平庸的“大众文化”的名义破坏各种审美标

准。这个第二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有时在其终极价值标准——强度和特质——方面与第一种有部分重合，但是，它把这些看作是要捍卫的、与新的（工业化的、民主的、“大众的”）文明格格不入的长处，而不是由它去解放。这种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是反动的，而不是以未来主义的方式制定法规：它依然受制于“五彩缤纷”和“多种声音”（尽管它肯定会在“革命”时畏缩不前），把这些看作是受到了它的当代环境灰色的各种“标准化”压力的威胁。世界越是变得灰色，它本身启示录式的言辞读起来就越是耸人听闻——扼要地说，T. S. 艾略特在《荒原》里从他的大臣烤豆晚餐（“摆出罐头中的食物”）中看出了对于一种从荷马下传给我们的“伟大传统”的终极威胁。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到现在成了垂死的手，而不是亲兄弟。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下面几篇文章中评论说的，这种社会姿态有可能作为一种关于语言的主张而获得成功：“普通”语言是陈腐的、单面的、抽象的；而“诗歌”语言在努力使感知具有新的活力时，相应地包含着难懂的、经验的形式。这个论点也抓住了我们习惯于用括号括在一起作为“现代主义”的很多东西：福楼拜和他的《被认可的观念的词典》，亨利·詹姆斯无止境地纠缠的晚期风格，艾略特关于现代诗人需要“把语言（如果有必要就打乱秩序）强加到其意义中去”的观点，⁷ 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尤利西斯》最后几章或者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的叙事错乱。在普通语言和诗歌语言（或者小说方面的“事序结构”和“叙述结构”）的二元对立之中，各种文化上的政治都是有可能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可以破坏常规化的语言学上的期待：（1）因为更新了了的感知是一种康德式的以其本身作为结果（俄国形式主义）；（2）因为通过把社会规范显现